



屠岸先生

## 他的诗歌创作经历 整个中国新诗史

屠岸原名蒋壁厚，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。他学鲁迅，用母亲的姓作为笔名的姓，名为叔牟。在我们寻找先生留下来的访谈和文章中，我尤其注意到他对自己诗人身份的重视，可以说，屠岸将一生都献给了诗，他曾经说过：“我是诗的恋者，无论是古典、浪漫、象征、意象；无论是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只要是诗的殿堂，我就是向那里进香的朝圣者。”他出过大量诗集，代表作有《萱荫阁诗抄》《屠岸十四行诗》《哑歌人的自白》等。我最近买过先生的一本《屠岸诗文集》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，体例是套装的形式，一共八个分册，其中诗集就占了四本，洋洋洒洒都是精选之作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作为诗人，屠岸的贡献不必多说，他是当今中国最老一

# 他是君子屠岸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叶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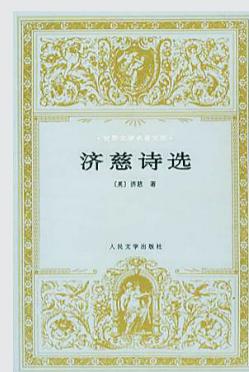
2017年12月16日下午5点，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出版家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，在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这是一个令人沮丧，难过的消息，因为就在今年6月14日，屠岸先生还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坤国际诗歌节。



屠岸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



屠岸先生手稿。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



作者：[英] 约翰·济慈  
译者：屠岸  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 
时间：1997年11月

批诗人中，仍宝刀不老，继续创作的诗人之一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的创作经历了中国新诗的整个历史。尤为需要注意的是，按批评人骆寒超的说法，“他是从1940年代迄今这一长段新诗史的见证人。屠岸1940年代初正式从事诗歌创作，收在《深秋有如初春——屠岸诗选》中那首写于1941年的《参与商》，是今天能见到的第一首新诗。把这首诗和他最近发表的诗连起来看，他的诗龄已有六十八年。中国诗坛有幸，还活跃着一批诗龄如此长的老诗人。

让我们来看先生的一首诗歌《西部河流》：“冰川想起一些雪白的伤口／沙漠想起一些绿色的梦”，“既然海洋很远／就义无反顾地走进死亡的内部／与沙漠谈一些血脉的话题”。作者似乎不想直接书写眼前的所见，而是把它们作为沉思生命万物的材料，这种比喻方法在当时看来，是汉语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。在提到自己写诗的经验时，他说：“我写诗也是完全投入，把生命撒播到吟咏对象中去，把自己变为客观事物的化身，激活对客观事物充分的新鲜感……这样就会对事物有新的发现，构成一种灵魂的颤动，使自己的思维和观察都是新鲜的鲜活的。惟此，诗歌创作才不会衰老，才可能避免重复自我，即使到老年也有希望写出常青常新的诗。”当他被采访问到属于哪个流派时，他说：“我很难确定自己属

于什么流派，什么主义，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。总的说来，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，关怀群众，关怀民族，关怀国家的初衷。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。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。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。但没有爱心，诗歌就没有生命。”

## 他是硕果累累的翻译家

除了诗人，屠岸的第二个身份是翻译家，如今在京东、当当等网站搜索先生的名字，可以看到，他的译作很多。他小时候跟父亲学过日语，后来又学过英语、法语。他翻译的书籍主要有《鼓声》（惠特曼诗集）、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、《迷人的春光——英国抒情诗选》（与卞之琳等合译）、《我听见亚美利加在歌唱——美国诗选》（与杨德豫等合译）、《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》、《济慈诗选》等。作为翻译大家，屠岸为中国汉语翻译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，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学宝库中的一笔财富。

这里要特别提到《济慈诗选》，这是他花了3年时间翻译的，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。2001年8月至10月，屠岸趁着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学的机会，游历了伦敦济慈故居，并把《济慈诗选》译本郑重地赠给济慈故居管理处。屠岸说：“虽然我的译本是必朽的，但是济慈是不朽的。”屠岸版本的济慈诗歌，可谓是最传神的译作，有位专家评论说：“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，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。而屠岸的《济慈诗选》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。”而他的翻译理论也影响着后来从事翻译的人，尤其是他对诗歌这一形式的翻译与其他体裁的不同所做的区分，是最深入人心的，他说，“译

诗与翻译其他门类相比对翻译者要求更高，不仅要将原作的形式传达过来，更重要的是要传达原作的神韵。译诗应该是两个灵魂的拥抱，实现译者与原作者的合一，实现两种语言的撞击与交融。”

可以说屠岸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，他亲自执译笔，《济慈诗选》历经500余次修改，此后不断再版，累计印数达60多万册，历尽磨砺，终成经典。

## 他是正直谦虚的出版家

屠岸的第三个身份是编辑家。从1973年起直到1987年离休，屠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，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。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，他回忆说，屠岸与人交往，永远面带和善微笑，目光炯炯，神情专注。他记得大家时常提起屠岸和郭沫若“叫板”的事。上世纪50年代，郭沫若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波斯诗人奥马尔·哈亚姆的《鲁拜集》，在人文社出版后，屠岸发现其中有些地方有硬伤，存在误译，便去信商榷。一次屠岸与郭沫若偶然相遇，又当面质疑。这件事也被传为翻译界佳话。屠岸自己说，“如果编辑只做一个‘二传手’，把作者的稿子直接送到排版厂，那么出版社就该关门大吉了。”要知道屠岸对编辑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是和他的性格分不开的，他的同事们都称他为谦谦君子，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李昕曾发表长文，标题即为《君子屠岸》。李昕回忆说，当年评职称时，作为总编辑的屠岸放弃参评，说这样便于对群众做思想工作。他一直住在50年前单位分配的破旧楼房，曾戏作《斗室铭》：“隶篆依次立，水墨笼三墙。……可以阅莎士，听肖邦。”



屠岸先生的画作